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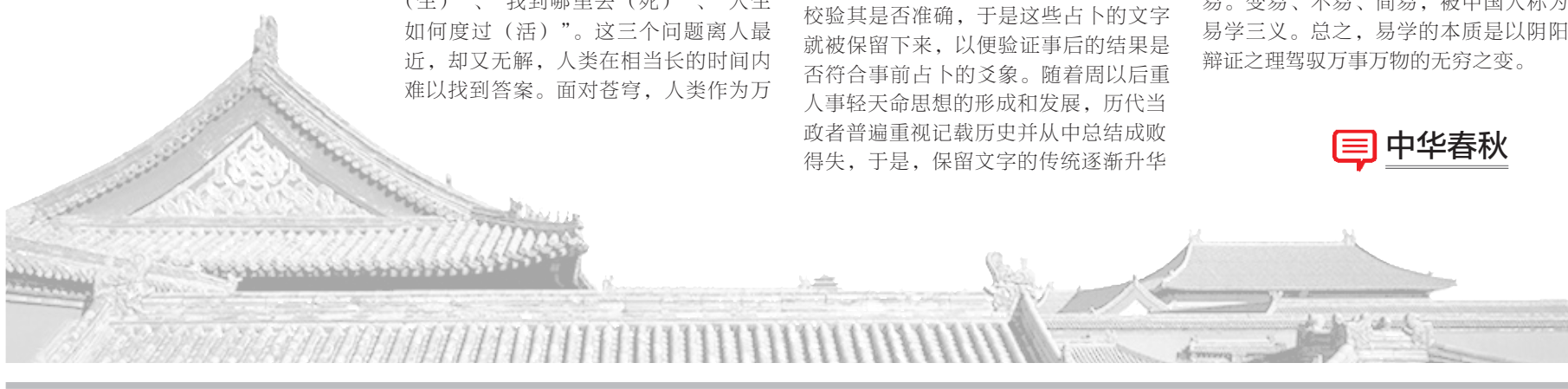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

□ 顾 春

关于中国的传统社会，有几个问题是必须要回答的。这些问题是：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什么；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；中国传统社会分为几个阶段；传统的中国人有哪些特点。回答了这些问题，就有可能准确认识和解释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。

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特点

相对于其他民族和社会，中国的传统社会和中华民族具有自己的特点：一是历史十分悠久。即使从学界公认的商代算起，也有3700年的历史。二是种族未曾更替。自远及今绳绳相继，从未因战争、瘟疫等原因而灭种异族。在数千年的变迁中，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相推相荡、相互融合，虽历经无数曲折，而最终形成了融多民族于一体的共同的中华民族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。三是文化没有中断。中华民族自有文字以来，主流文字一直为汉语言为基础；在意识形态上，虽历诸代百家争盛，并之以外教东渐，而相辅相生、一脉相承，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独特的华夏文化体系；生活习俗也相沿有序。四是史载传承有序。不仅历史记载连续清晰，而且现存的典籍汗牛充栋、浩如烟海，史记以下，正史、实录、方志、谱牒等灿然在列。五是统一成为大势。争雄之战国，对峙之南北，颀颀之宋辽，虽历九曲，数度分合，而疆域与日俱弘，形成了幅员辽阔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。



中华春秋

用人策略随机而动

——刘邦用人史话（下）

□ 陈家兴

刘邦与韩信

在重实际、看实践的用人方法主导下，刘邦之用韩信可说是充满了传奇，属于少有。

韩信当初仗剑从军，先投项梁部下，无人赏识。项梁身死，而跟项羽，项羽却只让他当了一个侍从角色的郎中。多次给项羽献计献策，项羽都不用。在刘邦被封为汉王后，韩信离开项

影响中国传统社会的最主要因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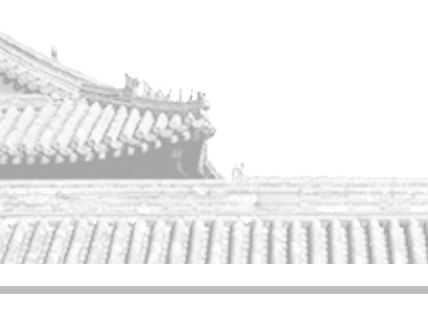
中华民族的这些特点，是由三个主要因素所决定的。一是秦始皇所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度。这一制度的长期坚持，保证了政令的畅通、不同民族和地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家的统一。二是以大一统和忠孝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。这一思想体系的长期贯彻，大大促进了各民族间以文化认同为旨归的民族认同，形成中华民族的共同民族心理。三是科举制度。科举制度消灭了贵族和门阀，调整了社会阶层和结构，促进了社会公平，传播了主流文化，形成了精英治国的政治传统，对后期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按照这一理解，可以将中国的传统社会分为三个阶段。从商周到秦以前，为天子联合奴隶主贵族共同统治社会的时代。从秦至唐，为皇帝联合地主贵族共同统治社会的时代。从宋至清，为皇帝联合士阶层共同统治社会的时代。

传统的中国人有哪些特点

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，中国人具有以下三个特点。一是崇拜祖先。二是崇拜文字。三是以阴阳辩证的思想方法认识和解释世界。

关于崇拜祖先。中华民族历史悠久，而种族又一脉相承，这就为崇拜祖先传统的形成提供了可能。在世界各民族中，远古时代的图腾崇拜，大多演变为后来的宗教。宗教之所以产生，其原因在于人类固有的理性与孤独之间的矛盾。人类固有的理性，让人必然思考三个最基本的人生问题：“我从哪里来（生）”、“我到哪里去（死）”、“人生如何度过（活）”。这三个问题离人最近，却又无解，人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找到答案。面对苍穹，人类作为万



物之灵十分孤独，是地球上唯一有理性并思考这些问题的种类，不可能从其他种类那里得到启示和答案。内无所得、外无所应，于是人类便从传统的图腾崇拜中逐渐制造出了比自己高明的“神”。然后将这个神高置于自己的对面，自己匍匐在下，向神发问。于是，宗教就这样产生了。

中国的先民们也同样要思考这三个人生问题。但是，中国从来没有成为过神教社会。在商代，“国之大事，唯祀与戎”，每次祭祀祖先和出征打仗前，都要占卜，这是图腾崇拜的余绪。但自周朝周公因发现天命不可恃而提出“敬天保民”思想后，中国的文化开始了重大的决定性转向——通过祖先崇拜上代图腾、下接神灵。按照祖先崇拜的思想逻辑，人生的三大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：我从哪里来——我从我父母那里来，为我父母所生。父母又有父母，此之谓生生不息。一言蔽之，我来自祖先。作为代相传承的历史和现实见证，家谱、祠堂、祖坟等自然而生。我到哪里去——死后入祖坟、上家谱，成为祖先的一分子。人生如何度过——孝敬父母、忠于君王、光宗耀祖，为家族承担自己的责任，并从中实现人生的价值。按照这一思想逻辑，人生三大问题的答案完全是可以理解和验证的，而不是先验的。中国人祖先崇拜的形成，是中国人实用理性的必然选择和结果。

而关于崇拜文字。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。由于占卜的结果要校验其是否准确，于是这些占卜的文字就被保留下来，以便验证事后的结果是否符合事前占卜的爻象。随着周以后重人事轻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，历代当政者普遍重视记载历史并从中总结成败得失，于是，保留文字的传统逐渐升华

楚齐20万联军，击杀项羽大将龙且。在垓下之战中，以“四面楚歌”瓦解敌人斗志，终致项羽自刎乌江。

其时，韩信威震天下，打下齐国后，便向刘邦请封为代理齐王。这表明，韩信功利心重，刘邦对韩信则起疑心。在那样的争雄年代，大将在外而求封王，在大将自身看来是担心君主日后不兑现承诺，以为先到手的才是实惠的，而在君主看来则无异于想自立门户，彼此嫌隙已生，想要修复却是难了。

韩信被封为齐王后，项羽先后派涉、蒯通游说韩信，“为汉则汉胜，与楚则楚胜”。然而韩信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刘邦。此时韩信只是重功名利禄，内心还是忠于刘邦，若他一反，刘邦便会功尽弃。

接天下平定之后，韩信却渐渐生反意。这正是韩信愚蠢的地方。在陈稀被任命为赵相时，韩信和陈相约，“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”。后陈稀果然谋反，刘邦率兵讨伐，韩信却给陈传递消息：“弟举兵，吾从此助公。”不意消息走漏，吕后同萧何计赚韩信入宫而缚杀之。刘邦闻信则“且喜且怜之”。这一喜，喜的应是祸患去除可以安枕；这一怜，怜的应是韩信建盖世功勋，却毁于一叛。

综观刘邦对萧何、曹参、周勃、张良、韩信五人的任用，充分表明刘邦注重实际、论功行赏、量才录用的用人思路，对于夺取天下来说是非常管用的。

刘邦在得天下之后，与陆贾还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。当时，陆贾向刘邦进言，常引用《诗》《书》中的话。刘邦便骂他：“乃公居马上而得之，安事《诗》《书》！”陆贾则对道：“居马上得之，宁可以马上治之乎？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，文武并用，长久之术也。”意谓马上能得天下，但不能在马上治理天下，商汤周武用武力夺得天下，治理天下却是靠顺应民心的仁义政策，文武并用，才是长治

久安之良策。应该说，这一对话让刘邦感悟良多，当时刘邦“不怩而有惭色”，让陆贾专门写一本书，即为《新语》：“诚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，及古成败之国。”后来，刘邦在去世的前一年，即公元前196年2月，发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书，这就是《高帝求贤诏》：

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，岂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类由进？今吾以天之灵、贤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。欲其长久，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我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贤人大夫，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御史大夫昌下相国，相国酈侯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。其有意称明德者，必身劝为之驾，遣诣相国府，署行义年。有而弗言，赏赐。年老癯病，勿道。

这一著名求贤令，可谓广开举贤荐能之门，与刘邦此前的多重实践检验大不相类。对这一求贤令，后人多有评点。明人凌稚隆《汉书评注》卷一下引曾巩的评价称：高帝平时侮慢学士大夫，至取儒冠溺之；所与成功者，多贩缦屠狗之徒。及天下既平，乃屈意求贤，如恐不及。盖知创业与守成异也。这一评价很有道理。如果说平天下时，用知根知底的人，从实践中提拔人才，论功行赏、量才录用，是极为有效的用人策略。但在治理天下时，选用贤能可以重实践，但不可唯实践，用人的视野必须更加开阔。因为有的人才未必愿意让你知根底，甚至自己就无意功名。同时，实践检验人才往往还需要时间，哪能像战争年代那样立时见效？而治理天下顺应民心，是长久之计，非一朝一夕可成。只有把各式各样的人才都笼络起来，发挥他们的作用，才是治天下的通途。这道求贤令，展现的正是这样的开阔视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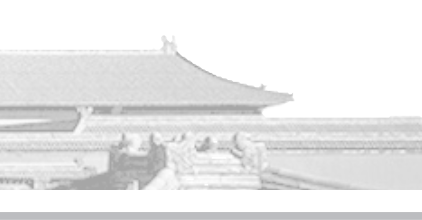
治天下的人才策略

治天下的人才策略

为文字崇拜。在中国古人眼里，文字的产生是件极大的事，史书的记载说，在仓颉造字后，“天雨粟，鬼夜哭”，天地都为之易色。正是由于中国人对文字的尊崇，从公元前842年的国人暴动后，中国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历史和文化记载。这些历史和文化记载的丰富性和连续性，为各民族所仅见。特别是东汉蔡伦发明的造纸术、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，为历史记载的传承和文化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条件。而自隋代以来的科举制度，又成为文化传播的强大推动力，于是，这些文字记载及其所承载的文化，不仅学在官府，而且深刻影响到了民间。在中国民间，普遍都有敬惜纸墨的传统（比如，小孩子如把有字的纸坐在屁股底下是要挨打的），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成为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念。

关于阴阳辩证的思想方法。源于原始的占卜之术，易经从中而生。从秦汉以后，易经便沿着两个方向并行发展。一是继续作为占卜之术而流传，一是发展易经中的阴阳之理，并以阴阳之理来认识和解释万物。早在秦汉，就产生了解释易经之理的易大传，共十篇文章。在易经的后续发展中，卜术一路逐渐式微，而易经之理却被发扬光大，并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，易大传也与易经本文共同被称为易经。在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大的四书五经中，易经以其阴阳辩证的思想方法，而位列五经之首。易经之理主要是三句话，一是认为天下万事万物的道理是无穷的，这叫做变易；二是这些无穷的道理都是阴阳之理的变种，阴阳作为决定无穷道理的根本是不变的，这叫做不易。三是掌握了简单的阴阳之理，就可能认识和解释无穷的道理，这叫做简易。变易、不易、简易，被中国人称为易学三义。总之，易学的本质是以阴阳辩证之理驾驭万事万物的无穷之变。

中华春秋



久安之良策。

应该说，这一对话让刘邦感悟良多，当时刘邦“不怩而有惭色”，让陆贾专门写一本书，即为《新语》：“诚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，吾所以得之者何，及古成败之国。”后来，刘邦在去世的前一年，即公元前196年2月，发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书，这就是《高帝求贤诏》：

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，伯者莫高于齐桓，皆待贤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贤者智能，岂特古之人乎？患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类由进？今吾以天之灵、贤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为一家。欲其长久，世世奉宗庙亡绝也。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，而不与我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贤人大夫，有肯从我游者，吾能尊显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御史大夫昌下相国，相国酈侯下诸侯王，御史中执法下郡守。其有意称明德者，必身劝为之驾，遣诣相国府，署行义年。有而弗言，赏赐。年老癯病，勿道。

这一著名求贤令，可谓广开举贤荐能之门，与刘邦此前的多重实践检验大不相类。对这一求贤令，后人多有评点。明人凌稚隆《汉书评注》卷一下引曾巩的评价称：高帝平时侮慢学士大夫，至取儒冠溺之；所与成功者，多贩缦屠狗之徒。及天下既平，乃屈意求贤，如恐不及。盖知创业与守成异也。这一评价很有道理。如果说平天下时，用知根知底的人，从实践中提拔人才，论功行赏、量才录用，是极为有效的用人策略。但在治理天下时，选用贤能可以重实践，但不可唯实践，用人的视野必须更加开阔。因为有的人才未必愿意让你知根底，甚至自己就无意功名。同时，实践检验人才往往还需要时间，哪能像战争年代那样立时见效？而治理天下顺应民心，是长久之计，非一朝一夕可成。只有把各式各样的人才都笼络起来，发挥他们的作用，才是治天下的通途。这道求贤令，展现的正是这样的开阔视野。

晚晴一代名臣翁同爵，留下了大量家书，从中可以看到他写给家人最真挚的文字，这些文字少了许多俗世的客套与讳饰，不仅具有记录历史的史料价值，而且还能从中见证他为官的修养与格局。

修身

翁同爵多次告诫自己的孩子读书养性，用来实现远大志向。当自己儿子正当年少之时，翁同爵在家书中不断提出告诫：“盖汝此时作闲曹，正可多读有用之书，以长学识。”“吾前书谓时文功夫，不可荒废，须多读多做。”等到儿子年龄增长、阅历增加、交往增多之时，翁同爵仍然不忘告诫儿子继续保持良好读书状态以充盈自己内心：“汝新年酬应自不能少，过此尚宜闭门静坐，勿事征逐，时文须随时浏览，不可高阁置之。”通过读书，可以明理，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实现远大志向。

中国传统修身之要在于于提升个体内在修为，深刻地影响个体成长与发展，这样才能帮助个体行走正道。然而，内在的修为与外在的影响是联系在一起的，确保良好内在修为基础上，如何正确对待外在影响特别是避免外在在不良影响显得尤为重要。听闻翁曾翰在京城能够静坐家中读书，翁同爵“闻之尤慰”，仍然告诫其子：“盖人家子弟，所以沾染习气者，皆由于出门征逐，饮食嬉游，遂渐渐立脚不定，流为纨绔耳。”一旦沾染不良社会习俗，交往不良友朋，沉湎于声色犬马生活，不仅会毁掉自己，而且会恶化社会风气。

为官

贾昌朝在《戒子孙》中说：“仕宦之法，清廉为最。”古代社会，正直的官员对官声最为看重。衡量官声的最佳标尺就是官员的清廉。古代官员要想做到为官清廉，首先要从思想意识层面认识到清廉的重要性，首先需要树立知足意识。翁同爵在家书中说：“人生宦途处境，均不可不知足”。这句话可谓是在宦海生涯中对于为官要清廉的经验总结与概括。进一步来讲，还需树立廉洁奉公的意识。翁同爵在家书中谈到自己的为官准则：“吾既无知人之明，又乏生财之术，良用自愧，惟有廉洁自持，谨慎将事，就吾才识所能及力量所能到者为之，不敢有负国恩、有负家声也。”翁同爵在家书中谈到自己管理过的地方吏治：“尚皆爱惜声名，不至逾闲荡检，然亦间有贪鄙齷齪之徒，营谋钻刺，拜门行贿者。”这些“贪鄙”之人违背节俭精神，贪污敛财，败坏社会风气。为官多年，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和政治智慧，翁同爵能够认识到权力不能用来生财、不能用来交易，否则就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：“理财之道，吾所不明，然既不能生财，惟有节用一端而已。石襄翁不徇情面，不避嫌怨，诸事均可师法。吾惟有循其旧章，丝毫不敢改易，决不肯以国家毫末做自己人情。”

官员之勤，是对本职工作的最好诠释。针对部分官员的不作为，即所谓的“惰政”，辛勤工作成为治理该问题的钥匙。翁同爵历任多职，每到一个新的岗位，他都不敢懈怠，以勤为主，认真对待工作，赢得了较好官声。他在家书中强调一种担当的精神：“惟有就吾才智所能及、力量所能到，尽心力为之而已”，这种担当如果缺乏辛勤工作作为支撑是不能持久的。他以自己工作之“勤”为赞：“吾履任后，已将匝月。一切公事粗有端倪，案

稿之繁，终日伏案仅了七半，夜分必至子刻方能竣事。”翁同爵还能以“勤”为标尺，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：“吾在此身体甚好，每日公事虽多，然吾如学生作功课，定时刻逐渐做去，故尚不觉其劳苦。夜间至二鼓后即可告竣，亥正子初便可高卧。”

处世

忍让为怀，宽宏大量。父辈为了使自己的后代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或光宗耀祖、荣耀门庭；或让子孙在残酷现实环境中明哲保身，将自己的人生经验、社会阅历传授给子孙，让子孙更好地协调好人际关系并且找到处理社会事务的具体方法。为人处世中难免有不如意事，如何正确对待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翁同爵告诫儿子不要太在意外界流言蜚语：“第汝现在以吾罢居外任，稍要好，则人言其阔；稍从俭，则人议其啬，较吾所处为尤难耳。”

祸从口出，言必慎重。由于个体的天然差异，导致信息占有、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理解不同，对于他人的个人品质和能力素质会造成影响的语言，古人比较强调慎言。俗话说：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”。石成金在《纂得确二集》中谈到“惜言”的几个方面：“不说人密事，不臧否人之品藻，不犯人忌讳，不伤人父母，不破人一切好事，不起人事端。”翁同爵告诫在京的儿子翁曾荣、翁曾翰：“汝兄弟在京，语言须谨慎，切勿信口议论。至嗣，至嗣。”“信口议论”不免陷于道听途说，自己亦成为传播“道听途说”的个体，难免会造成“受害者”背负舆论和道德谴责。此后，翁同爵又于同治四年6月26日致信在京的儿子翁曾翰，再次强调要慎言：“汝在京中，一切皆须谨慎，见人言语，切勿随便。”

尺牍方寸心家书传清白

□ 石志刚

尺牍之繁，终日伏案仅了七半，夜分必至子刻方能竣事。”翁同爵还能以“勤”为标尺，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：“吾在此身体甚好，每日公事虽多，然吾如学生作功课，定时刻逐渐做去，故尚不觉其劳苦。夜间至二鼓后即可告竣，亥正子初便可高卧。”

处世

忍让为怀，宽宏大量。父辈为了使自己的后代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或光宗耀祖、荣耀门庭；或让子孙在残酷现实环境中明哲保身，将自己的人生经验、社会阅历传授给子孙，让子孙更好地协调好人际关系并且找到处理社会事务的具体方法。为人处世中难免有不如意事，如何正确对待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翁同爵告诫儿子不要太在意外界流言蜚语：“第汝现在以吾罢居外任，稍要好，则人言其阔；稍从俭，则人议其啬，较吾所处为尤难耳。”

祸从口出，言必慎重。由于个体的天然差异，导致信息占有、表达能力和对事物的理解不同，对于他人的个人品质和能力素质会造成影响的语言，古人比较强调慎言。俗话说：“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”。石成金在《纂得确二集》中谈到“惜言”的几个方面：“不说人密事，不臧否人之品藻，不犯人忌讳，不伤人父母，不破人一切好事，不起人事端。”翁同爵告诫在京的儿子翁曾荣、翁曾翰：“汝兄弟在京，语言须谨慎，切勿信口议论。至嗣，至嗣。”“信口议论”不免陷于道听途说，自己亦成为传播“道听途说”的个体，难免会造成“受害者”背负舆论和道德谴责。此后，翁同爵又于同治四年6月26日致信在京的儿子翁曾翰，再次强调要慎言：“汝在京中，一切皆须谨慎，见人言语，切勿随便。”

中国古代官德